



“笔记体”小说 汇集百态“消息”

《消息》中的诸篇佳作虽有着独立情节和不同风格，或沉郁雄浑，或凄清悲凉，或清虚冲淡，或激情昂扬，但把它们串联起来，便构成乡土中国的多彩剪影，折射出生活本真的“消息”。

2022年至2024年间，贾平凹自书房走出，深入故乡商州的乡镇，又远涉陕南、陕北的村寨，以及黄河、渭河沿岸的甘、晋、豫、鲁四省，进行系列采风活动。在田间乡野、镇街市廛，贾平凹倾听普通人的故事，记录下很多手记，并最终创作出这部“笔记体”的《消息》。

从体裁来看，《消息》可被视作一部短篇作品合集，其中大部分都能归入短篇小说的范畴。这些小说涉及多元题材，其中有谈玄说幻的志怪小说，有描摹世情的志人小说，还有一类小说则是作家借虚构故事来自抒胸臆，其中可以明显看出作家的影子，不妨称之为“志己小说”。

志怪 虚构中透着某种真实

《消息》中的志怪小说，有着中国古代文学的流风余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志怪小说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它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风所及，影响深远，至《聊斋志异》而达到顶峰。古典文学中的志怪小说，留下许多有关神仙鬼怪、殊方异物的生动故事。它们为现当代文学的创作积累了养分，树立了楷模，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创作的小说《铸剑》，其故事就来源于晋代干宝所著的志怪小说《搜神记》。

在《消息》中，贾平凹赓续古典文脉，汲取民间养分，也创作了一些具有当代范式的志怪小说，如《集市》《童山狼》等作品。在《集市》中，贾平凹描述一个游手好闲的街溜子，在乡镇集市上遭遇的离奇怪事，其中对集市上贩夫走卒的叙写，于玄幻的境界中又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童山狼》采用双线叙事，分别讲述一匹人畜无害的独狼和一位温柔善良的农妇的故事，他们彼此虽为异类，却有着相似的悲苦遭遇。这篇小说的情节，有一种“庄生化蝶”般的恍惚迷离，细细读来却让人唏嘘。该书中的志怪小说，虽然有些荒诞不经，但又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于虚构中透着某种真实。

志人 呈现乡土中国的纷纭世相

贾平凹的作品一贯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消息》中的志人小说刻画的多为乡野中的人物形象。他们秉性各异，遭遇不同，其中有基层干部、乡野村民、民间艺人、阴阳先生、山中隐士……呈现基层社会的群体复杂性。在书中，贾平凹以“八面出锋”的笔法，以及群像式的表现，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从不同视角呈现乡土中国的纷纭世相，以及村镇生活的原生风貌，产生一种“多点成面”的效应。

在表现形式上，《消息》追求丰富多变的写法。其中很多故事采用白描方式，简练而传神。《柳嫂哭灵》一篇则

别出心裁，运用独白形式，通过一位农妇在亡夫灵前的哭诉，讲述了一段农家的奋斗经历，以及接连遭遇的不幸变故，读来像一段控诉命运、有悲有恨的咏叹调。同样是对村镇干部的刻画，《海坪》体察了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某些腐败现象，而《西洛水》则表现了村镇干部“还山以绿，致富于民”的动人事迹，两相比较，浊清分明，可谓“一样水土养百样人”。同样是写乡村旅游，《蛤蟆》与《桃花谷》在立意上也有不同，体现了贾平凹鱼龙百变的艺术手法。

志己 写作其实都是写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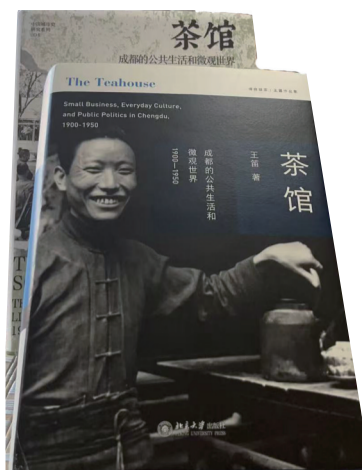
贾平凹说：“作家写作时，其实都是写自己。”《消息》中的故事，题材或采自民间，但其中有作家的选择取舍、价值判断、加工润色，无不带着作家的精神烙印。还有一些故事，甚至可以视为作家生活经历的镜像，例如该书的最后一篇故事《诉苦》，颇有些卒章显志的意味，是“志己小说”的代表篇目。

《诉苦》中的主要人物“第五门”是一位乡村出身的知名作家，他平日里“独惯了”“不善于结交，不受到热闹处，性子拗，说话直”。但在乡亲们看来，他经常在重大场合亮相，可谓声名赫赫，风光无两，觉得他关系熟络、门路广阔，于是不免有亲友上门请托办事。但面对诸般力有不逮的请托事项，第五门又着实无可奈何。这篇故事也许在情节上有所虚构，但第五门应对凡俗事务时的种种苦恼，大概贾平凹也有所经历，或者感同身受，于是在书写中表现出一种“理解之同情”。或者可以这么说，在精神层面上，第五门约等于贾平凹。

《消息》中还有一些篇目，以写实笔法对黄河流域的山川风物进行精彩描绘，实为非虚构的散文佳作，可以称为“山河志”，如开篇之作《黄河晋陕大峡谷》，以及《仓颉庙》《三河口》等篇目。《黄河晋陕大峡谷》以恢宏的笔势描绘黄河的奔流、文化的厚重，读来荡气回肠。“黄河河面开阔，汪洋一片。时而厚云积岸，大水走泥，时而五彩祥光闪耀，荣光耀河……”这些描绘山川风物的篇目，有着《山海经》的神韵，它们像电影里的空镜头，为书中的故事勾勒出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叙事背景。

贾平凹以广阔的行迹、深入的体察，收集了丰赡的素材，再以文学的巧思加以催化，酿成了《消息》中的诸篇佳作。这些故事虽有着独立情节和不同风格，或沉郁雄浑，或凄清悲凉，或清虚冲淡，或激情昂扬，但把它们串联起来，便构成乡土中国的多彩剪影，折射出生活本真的“消息”。

据“学习强国”平台



一杯酽茶照光阴

——读王笛《茶馆》

为“淫词艳曲”，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她人”却不可以看得这一基本逻辑立场。

1949年以前，四川有“十男九袍”之说。茶馆里除了普通民众在这里休闲娱乐、消磨光阴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成都泡茶馆的人中有大量袍哥出入，甚至有许多袍哥将自己的堂口就设在茶馆里，于是茶馆里经常就会有“摆茶阵”“吃讲茶”出现。《茶馆》中引述川籍作家李劫人作品中描述过帮派们吃讲茶的经过：谁人多势众谁就能赢，大家争执一番，调解人“两面敷衍”，一般判势弱的一方为输，而输者也不用赔礼道歉，不过得付所有茶钱。传统的司法活动中，往往重视刑事案件，而对于民事纠纷则认为属于“细故”，交地方绅老或保甲长调解处理。理想的纠纷处理方式是“耆老一唱众声和之”，在“差序等级”的社会格局之下，以“礼”“让”为核心的道德判断可以代替一部分以“权利划分”为内容的法律判断。但正如作者所引述的《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中所记载的案例那样，对于已失去身份羁绊的普通市民来说，道德说教对他们有多大的说服力？尤其是在袍哥介入纠纷后又有多少道德号召力让人们臣服于他们的裁决？

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除了喝茶、听戏以外，还有许多茶客在那里打麻将、掏耳朵、理发和擦皮鞋。茶馆，特别是那些街角小茶馆必须调整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边界，尽量让每一个进来的茶客感到舒服，愿意“泡”在那里。就比如“喊茶钱”，老成都人一进茶馆，就会有人喊茶钱我付了，喊的人未必就真的准备为他人付账，听的人也未必就想让他付那区区几文，为的是凸显双方当面的面子和那热乎乎。堂馆会根据当事双方的身份和所了解的关系热络程度决定收不收茶钱、收谁的茶钱。如果判断错了，看着“喊茶钱”的人在那里举着钱嚷嚷，堂馆真收了钱，付钱的茶客就会把气撒在堂馆身上。

当今的城市生活已完全变成公共社会，人们即便住在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也不会发生太多交集。在公共社会里人们更加注意自身权益的维护，于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面临着更多挑战。书中记录的2003年余女士诉居委会的案子，充分折射出了在公共社会个人权益与大多数权益发生冲突后的困境。余女士所住小区将一间空房改造成活动中心，居民可以在那里喝茶、打扑克、打麻将。家住二楼且正对着活动中心的余女士对活动中心夜以继日出发的噪音不堪其扰，于是将居委会以组织居民打麻将扰民为由告上了法庭。庭审中，居委会组织居民投票决定是否关闭活动中心，结果整个小区除余女士外全部反对关闭。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关注。本案中，余女士绕过茶馆这一争议交点，直指打麻将涉嫌赌博应当关闭；而小区居民则指责余女士小题大做、破坏成都市的形象为由，对其大加挞伐。案件本来是大多数人的决议可否侵犯个人权益的问题，颇有法学家富勒提出的《洞穴奇案》讨论的性质。但无论是市民、居委会、法院还是《实话实说》栏目，都将议题变成了纯道德争议，最终以各让一步的调解方式解决。

1940年代，竹皮暖瓶出现，茶馆竞相购置暖瓶让茶客自己续茶以取代掺茶师的工作。如此一来，茶馆里少了人们喊加茶的喧嚣和掺茶师来回的涌动。一位“茶馆老饕”甚至投书报社感叹“温瓶出、茶道亡”。80年后，来成都的游客慕名到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品茶，看到这里还在用古旧的竹皮暖瓶为茶客加水，反觉新奇，纷纷用手机拍照留念……

时光静悄悄地流淌。以茶馆为舞台，以茶壶为道具，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还在不停上演，唯有那一杯杯茶水记录下生活的苦涩与甘甜。

柴禄

对成都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易中天的《读城记》，知道那是一座特别闲适的城市，那里的人们衷情于泡茶馆、摆龙门阵。后来先后看到作家阿年、琼瑶等人回忆童年时代“泡茶馆”的经历，特别是读到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文通“考试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楼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时，艳羨于成都茶馆的静谧与文雅，颇有生于斯、成于斯的期盼。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以下简称《茶馆》）是历史学家、澳门大学教授王笛所著的两卷本历史题材作品。作者以微观历史的视角，向我们全景展现了成都茶馆从1900年到21世纪初100多年的历史镜像。从茶馆的经营、行会、组织、秩序到茶馆里人们的约会、看戏、打麻将和掏耳朵，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新闻报道和时人回忆，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在100多年的岁月流淌中，成都茶馆的兴盛与衰落、茶客的欢喜与悲愁，以及茶馆作为公共空间所折射出的时代印迹、“福柯惩罚与规训”体系下的市民同社会管控之间的互动。

有成都人将自己的生活目标描述为“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遍布城市的各色茶馆几乎可以满足成都人的上述全部欲望：堂皇雅致的高档茶楼可以进行商务活动；大的茶馆可以边听川剧边摆龙门阵，进行各类社交聚会；街角的小茶摊上可以听着“打围鼓”、打着小麻将，度过平淡的一天。泡茶馆讲究“坐功”，曾有茶客从早晨天还没亮就到茶馆里喝早茶，直到夜已阑珊、店主要关门打烊，屁股都不曾离开过茶馆的竹藤椅。所以在作者所记录的百年茶馆生态中，无论是本地精英还是外埠介入者，泡茶馆更多是被描述为“浑浊与懒散”。

传统历史书写往往更多关注于重大事件的发生，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茶馆》则聚焦于芸芸众生相：以茶馆为生的小商小贩、剃头师傅、采耳匠、算卦先生、说书艺人，特别是戏曲演员。长久以来，茶馆为了吸引茶客，均有各种曲艺表演。除川剧外，更多的是一些民间艺人演唱的清音、道情和板凳戏，节目内容以取悦观众为主，像《十美图》《思秀才》以及流传于大江南北的《十八摸》这些俗文化均是茶馆的主角。因此在晚清和民国早期，茶馆是禁止女性入场的。

从《茶馆》中记录的一件档案中可以看出时人的一些想法：一名学习法律的吴姓学生在品香茶园中看戏，发现楼上厢房中有人向他吐口水，于是上楼交涉，却发现6个女人在楼厢里看戏。于是该名女生向维持秩序的警察举报，在警察一番敷衍未作处理后，该女生又向省警察厅写信控告茶园暗留妇女看戏。信中称“戏曲一端，乃补助社会教育之不逮，实开导愚顽一条觉路，其意义本善，但仍应取缔”“该园主人利心熏腾，热度膨胀，不顾风化之攸关，只求生财之有道，混淆黑白，泾渭不分。蔑视警令，违法抗法似此超越法律范围外之营业，何可任其自由”，进而指出“此区区戏园，如是他区，焉得不步后尘。全城戏园如是，危害社会何可胜言”。档案中没有反映警察厅最后的处理结果，不过这名法学生似乎是有理有据、正义凛言，却忘了如果戏曲确有教化作用，为什么女性不能得到教化？如果曲目